



金价暴跌 美国利用金融霸权操纵

继四五月份的大跌之后,黄金在6月份再次迎来暴跌。国际金价曾跌破1200美元/盎司,最低下探至1180美元/盎司,再次刷新了2010年8月以来的近3年新低。据统计,今年以来,国际黄金价格已累计下跌近30%。专家表示,受美国经济数据整体向好,美元走强等因素影响,黄金作为保值避险工具的吸引力大大降低,市场预期较为悲观,后市金价弱势调整的概率较大,当前不宜盲目抄底。

黄金多头力量几乎崩溃

国际金价跌跌不休,黄金多头力量几乎崩溃。6月份最后一周国际黄金价格继续下跌,直接破位1300美元/盎司,1200美元/盎司两个整数关口,6月26日受美联储收紧量化宽松预期和美元走强等因素打压,国际金价再次出现大幅下跌,跌幅一度超过3%,接近1200美元/盎司水平。大量止损操作再次引发多米诺骨牌抛售现象,6月28日早间国际金价一举跌穿1200美元/盎司关键阻力位,创下近3年新低。据统计,过去10天当中,金价已经下挫了近200美元,今年年初至今跌幅已超过28%;仅二季度单季就下跌了25%,刷新了1968年以来的最差季度表现。

人为操纵市场是主因

中国黄金协会副会长张炳南对记者说:“近来金价暴跌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个是内因,是黄金本身走势的内在调整需要;另一个是外因,是美国为了维护美元强势地位和金融霸权,人为操纵黄金市场的结果。”他指出,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源在美国,但美国可以利用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转嫁危机。“为了维护强势的美元地位,美国利用自己的金融霸权、舆论霸权,从2009年开始,首先打压欧元。欧元被打压下去后,日元成为下一个目标。然而,日元在2012年下半年被动贬值24%,等于用主动做空避免了主动做空。之后,能够挑战美元的就是黄金了。”

张炳南分析,“所以,从今年4月份开始,美国开始做空黄金。当时做空只有4月12日、4月15日两天,之后华尔街大鳄并没有再出手,任由以亚洲为代表的实物买盘接手市场,并推动市场重返1480美元,但是,之后实物买盘的作用力开始下降。进入6月份的这段下跌应该是第二波打压。上次的动因如果说是私营资本、金融资本主动做空,那么这次的动因应该是政府配合、政商结合,近期伯南克退出量化宽松的言论明显导致了金价剧烈波动。”

分析人士指出,过去10年黄金一直是牛市,而今年黄金的大跌是一种结构性的调整。当前,在美国经济复苏前景乐观、美元指数持续反弹走强的背景下,黄金货币属性和避险功能明显弱化,投资金货持续数日跑输黄金,技术面的不断下跌导致了近期金价暴跌。

尚难确认市场底部位置

“目前还无法确认市场底部的位置,仍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整。”张炳南预计,这一轮下跌之后,未来金价会在1100美元-1300美元之间浮动,在此区域震荡整固的可能性较大。针对投资者普遍关心的当前可否抄底的话题,张炳南认为,抄底主要是一种中短期的行为,从中期的角度来看,1200美元以下应该还是比较安全的。“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应该具有中长期的投资心态。投资黄金实际上是看重它在中长期资产配置中分散风险的战略价值,通过资产的分散性和组合性优化配置。”

此外,有舆论指出,当前金价已经跌破黄金开采成本,势必引起黄金开采量下降,黄金价格报复性上涨。对此,张炳南认为,首先,生产成本本身并不具备科学的衡量条件,全球黄金矿业由于矿石条件的差异和开采难度的不同,生产成本差别很大,无法简单衡量;其次,决定黄金价格更主要的因素是金融属性,是黄金在人类货币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和生产成本的高低关系不大。(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赵鹏飞)

近年来,央企高管又充当了“经济官员孵化器”,从央企培养提拔中共党政领导干部已经形成一条固定通道。

央企高管变高官:政绩、关系和博士学位都是砝码

央企高管虽然不是公务员编制,但是参照同级别的公务员管理,享受同等级别政府官员的待遇。近年来,央企高管又充当了“经济官员孵化器”,从央企培养提拔中共党政领导干部已经形成一条固定通道。因而,央企高管又被称为“准官员”。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企业与组织研究中心副主任聂辉华等人通过研究2008-2011年189位央企高管的职位变动数据,发现了央企“准官员”晋升之道——“政绩”、“关系”和“博士”都是晋升的重要砝码,“一个都不能少”。

从政比赚钱更具激励

“越来越多的央企高管出任地方高官,体现出中央对央企高管培养选拔的更加重视。”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介绍说。

随着“由商到官”的通道被打通,集“经济人”和“政治人”于一身的央企高管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从政还是赚钱?

聂辉华等人与杨瑞龙、王元共同撰写的论文《“准官员”的晋升机制:来自中国央企的证据》给出的答案是前者:来自央企高管而言,政治晋升比经济利益更加重要。

聂辉华分析,央企负责人大多主观上希望能转换为实权在握的党政大员。原因在于,即便他们做到央企“一把手”,行政级别最多是副部级,无法继续晋升。只有由“准官员”转变为真正的官员,央企高管才有可能在行政级别上有更高的提升,使其政治生命得以延续,如提拔为中央部委或地方省委省政府负责人(正部级)。因此,央企高管有很强的动力通过提高企业业绩获得政治上的回报。

晋升资本与模式

已经明确了晋升的目标,那么,如何积累自己的政治资本,为晋升铺平道路,则成为央企“准官员”亟需考虑的问题。

回顾已经“商而优则仕”的央企高管,他们大都生于上世纪60年代,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后上大学、参加工作的,年富力强是他们共同的特征。高学历是另一个重要特征。前述研究里的189位央企高管中,约4%获得升迁,拥有博士学位的占升迁比例的1/4。

事实上,2003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成立之初,即制定了《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实行年度考核与任期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并且将考核结果作为央企高管薪酬和职务任免的重要依据。“政绩和关系都很重要,两者通常是互补的关系。就我们研究的央企高管样本而言,政绩能够解释升迁原因的大约占2%,而关系能够解释的大约占3%。”聂辉华介绍说。

真正的晋升,一般是从央企负责人调到同等级别党政机关担任负责人开始。“这一变动虽然并未提升央企高管的行政级别,但却令他们有了进一步的晋升空间。”聂辉华说。

事实上,从央企负责人进入公务员系统的第一次变动,很少伴随行政级别的提升。晋升轨迹通常是,先调动到同等行政级别的党政系统岗位转变成官员身份,然后再在党政系统内进一步升迁。

论文设立了四个指标对“政治关系”进行了量化研究,发现仅有“是否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及候补委员或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这一指标对晋升影响较大。其他三个指标为:是否当选或曾经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是否有中央党政机关的工作经历,央企的总部是否在北京。不

过,这些对于央企“准官员”的晋升影响甚微。

去行政化势在必行

由于央企职位的经济报酬对央企官员的升迁没有显著的影响,使得央企高管更像是政府官员而非职业经理人。

事实上,这百余家央企高管的行政级别还要再分出“高低”。在国务院国资委公布的央企名录中排名前53位的央企为“副部级央企”,又称骨干央企。这些企业高管比照副部级官员,由中组部和国务院国资委企业领导人员管理局共同任命

转基因大豆油致癌说提出者:只是为了抛砖引玉

近日,在我国新批3个品种转基因大豆进口后,黑龙江大豆协会副秘书长王小语的“转基因大豆油可能致癌”说,再次引发公众对转基因大豆安全性的高度关注。

王小语在接受央视采访时称:“我依据自身在粮食行业20年的工作经历,发现致癌原因可能与转基因大豆油消费有极大相关性。比如,河南、河北、甘肃、青海、上海、江苏、广东、福建等地,基本都是我国转基因大豆油的消费集中区域,这些区域同时也是我国肿瘤发病集中区。而黑龙江、辽宁、浙江、山东、湖南、湖北、贵州等地基本都不以消费转基因大豆油为主,则不是肿瘤发病集中区域。”

不过,国内多位转基因领域专家表示,转基因大豆油会致癌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

专家:转基因食品致癌说没有根据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杨晓光告诉记者,现阶段世界各国批准的转基因食品都是在安全评测的基础上放行的,食用至今没有任

何证据导致癌症,没有任何实验数据能够证明转基因食品和癌症之间存在关联性。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也告诉记者,转基因大豆油消费多的地区癌症发病率高并不能证明转基因大豆会致癌,这种横向比较没有意义。

“首先,癌症发病率和很多因素相关,比如吃油太多本身就会导致各种心脑血管疾病;其次,以美国为例,美国的转基因大豆产品消费比我们多了,那美国的癌症发病率应该远远高于我们才对。但事实上,在吃转基因大豆之前和吃转基因大豆之后,癌症发病率并没有显著提高。”朱毅告诉记者。

一家知名种子企业的相关人士也表示,转基因大豆压榨后,油脂中并不含有转基因成分,转基因片段存在于蛋白质中。某食用油企业内部人士也表示,转基因技术只是转入了一个基因片段,这个基因片段存在于蛋白中,不影响大豆中原有的维生素E等内容,因此王小语关于“转基因大豆油中含有的维生素E对人体有极大的健康威胁”的言论也不成立。

呼吁公开试验

对于来自学界和业界的反驳,王小语表示,发出致癌言论是为了抛砖引玉,希望国家能对转基因大豆的安全性进行全面公开的试验。

“首先,我搜集的资料显示转基因大豆与致癌很可能存在高度关联性,因此

想给公众一个警示;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是想抛砖引玉,呼吁我国科研人员进行公开完整的试验,能用科学的数据证明我的观点是错误的;最后,我希望能促使大豆油上标注清楚是否使用了转基因大豆,给消费者自主选择的权利。”王小语说。

对于转基因食品缺乏公开试验的怀疑,负责对转基因生物安全性进行评审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彭于发解释称,食物跟药物不一样,药物之所以要做各种临床试验,是因为药物只针对少数特殊人群,而大豆、玉米等是人人都要吃的,因此“并不是没有标准,相反标准更加严格”。

“以环境为例,我们就会对基因流的影响,对土壤微生物的影响,转基因植物会不会比非转基因植物竞争能力强等方面进行研究。”该委员会成员、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卢宝荣表示,我国一直都是《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等严格的法律框架下进行的,对食品安全、环境安全、饲料安全等各方面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

(摘自《第一财经日报》文/夏清逸 叶啸 王蔚佳)

谢国忠铁杆粉丝称赌输了:不再相信房价会跌

乔东曾是楼市“唱衰派”代表队员谢国忠的铁杆粉丝。不过,在日前与老友的聚会上,他第一次承认:“关于房价这个赌,我打输了!”

10年前已在北京成家立业的乔东并不是没钱买房。2003年北京房价多数还不到5000元/平方米,很多人仅用积蓄和少量贷款就买了房。乔东的目标则是全款买房无外债。结果,攒钱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

乔东的“买房梦”与现实越来越远。

2006年元月,北京普通住宅销售均价已超7000元/平方米。乔东手里原本够买100平方米房子的钱,一下缩水到够买70平方米了。那时起,乔东和谢国忠、牛刀等学者一样,开始坚定认为中国楼市已经偏离轨迹,终有一天会掉下来!

乔东身边的朋友都先后买了房,有的卖小换大,有的已手持多套房。每一次听说朋友买房,他都奉劝其要谨慎出手:“没有只涨不跌的房价!”2008年的金融危机,乔东以为机会终于来了,

可没等自己反应过来,房价瞬间又涨了上去。

2009年,乔东辞掉稳定的工作下海做生意了!一晃5年,他的存款又多了一截,但完全没有身边卖了房子获利的朋友钱多。向来自信、从不在生活困难面前低头的乔东终于“服了软”:“关于房价的赌,输得很惨。不再相信房价跌了,我也打算出手买房了!”

不过,几年生意几次中断社保纳税的乔东,如今在北京失去了购房资格。从错过买、买不起再到买不上,乔东坦



这在欧洲是罕见的。中国的城市发展也并非美国式的,因为这里缺乏受人尊敬的房地产业企业家。

或许,中国还没形成什么模式。许多城市的发展奉行的是“尝试错误”的原则;若发展不顺利,就会终止之前的方式。例如对环境污染,许多城市对其代价已然一清二楚后才开始注重生态保护。中国的城市规划者大多缺少完整的生态知识。

此外,一个真正的大城市不仅仅面积大,还需要城际网络,就像上世纪90年代的纽约、伦敦和东京那样,如今这同样适用于中国。中国各地正大力发展基础设施,高速公路、高铁和桥梁,但在未来,更需要的是城市之间分享信息和经验,而不仅仅是物流。

言:“我因买房一事失眠的夜晚数不胜数,不过现在已经释怀了!在北京买不了,就回河北老家买。”乔东笑着和朋友们说:“我们县城的房价也4000多了,我打算买一套;其余钱还打算在我父亲留下的宅基地上盖一栋小二层。村里人都喜欢把装修钱花在贴瓷砖等外装修,我要实实在在地花在家里面,在那里养老。”

朋友提醒乔东:“这次要下手快、准、狠!不能让钱一直这么下去。”

(摘自《北京晨报》文/王丽娅)

德媒:中国城市生活乏味 缺乏独特个性

全球城市化还有一个基本观念:各城市必须彼此不相同,每个城市都需要拥有自己的个性——这正是中国所缺失的。这个国家新的大城市都在试图打造具有鲜明特征的标志性建筑。但这是不够的。一个城市的个性,需要独特的文化、生产力和消费模式。就如同到目前为止,新生的中国中产阶级只青睐西方产品,以后也应该多关注本土品牌。

摩天大楼还在这个国家戏剧化地增长,城市生活却变得愈加乏味。中国的城市缺乏自己的面孔。

(摘自《环球时报》文/亚历山大·古兹曼尔 译/青木)

和管理,所以他们又被称为“中管干部”,其余央企则为“正厅级央企”。

尽管聂辉华等人的论文发现副部级央企高管与正厅级央企高管相比,在政治晋升方面并不占显著优势,但王贵秀认为根据企业级别配备相应级别的央企高管任命人选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让一些有经营才能者因级别不够不能入选,而级别够标准的又未必具有经营才能。央企高管与官员的角色经常互串,央企高管的价值取向往往朝向“官场”而非市场。切断央企高管与官员之间的“脐带”十分必要。

取消国企的行政级别,一度是国企改革方向。但时至今日,国企和国企高管的行政级别制度仍然根深蒂固。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室主任杨林表示,现在的国企仍有行政级别,并且以此来标榜自己,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现象。究其原因,这些国企高管实质上只是“准”职业经理人,本质上还是官员。官员的职务、升迁抑或贬黜,考核自成体系,一个部企企业,其管理者必然要从部级官员产生,从市场上是不会产生的,这就意味着,央企高管一定是官场中的佼佼者,但未必是市场中的优胜者,制约他们的实质上是行政因素而非经济因素。

此外,一些政府官员在升迁无望或者临近退休时,被调至央企担任高管,合法地拿取丰厚的报酬。聂辉华认为这不只是一个很好的现象,绝不能把国企或央企当作官员的“养老院”,这会损害国企的活力,而且会导致权力寻租。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全国人大新闻发布会上说:“为官发财,应当两道”。可见作为央企高管,你不能既享有行政级别,又获得高额的经济报酬。”

2013年4月23日,国务院国资委要求中央企业发挥好“稳增长”的骨干作用,增加值增长要达到8%以上,利润增长要达到10%以上。聂辉华认为,此时央企承担了宏观调控的重要职能,要充当“熨平经济波动”的重任,其考核指标与宏观经济环境密切相关。“不过,从官员或央企高管的角度讲,考核方式就是指指挥棒。只有考核重心转向增长质量,比如资本保值增值率,央企高管才会更加重视增长质量。”聂辉华说。

(摘自《经济观察报》)

人大常委会委员 国企上缴利润90% 返国企使用

6月28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2012年全国中央决算报告。常委会委员表示,当前面临的“钱荒”并非真正缺钱,要缓解目前的财政困难,只有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同时,还建议国有企业上缴利润,用于民生。

关键词:“钱荒” “开闸放水”只会积累泡沫

连日来,“钱荒”引发关注,一些金融机构希望央行“开闸放水”。但国务院决定合理保持货币总量,下决心通过市场调节资金供求,恢复经济结构平衡。与此同时,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日前称,今年1-4月,中央财政收入19963亿元,同比下降0.8%。

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央行原副行长吴晓灵表示,经济增速的下滑必然加剧财政困难,必须转变过去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

吴晓灵称,2008年政府大规模投资留下后遗症,现在继续维持当时铺下的摊子是无能为力。现在“钱荒”不是真的缺钱,而是过去铺下的摊子和经济所能提供的信贷增长之间有巨大缺口。

吴晓灵建议做好融资平台违约、信托产品和理财产品违约的准备,只有出现这些现象,中国经济才可能走向理性发展的道路。

吴晓灵认为,如果现在“开闸放水”,只会使中国经济的债务泡沫继续累积,对未来是非常不好的,新一届政府应对这个问题早下决断。

关键词:国企利润 国企上缴更多利润

楼继伟日前介绍,2012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收入970.68亿元,完成预算的115%,加上2011年结转收入31.06亿元,总量为1001.74亿元。

国企上缴利润太低,一直备受诟病。6月28日审议时,彭森委员提出,去年国有企业的利润收入有2.1万亿,通过国有资本预算,能够集中收上来体现在财政收入中的只有900亿元左右,比例不到5%,这个钱还要还于整个国有企业再投入。

吴晓灵也提到,国有企业是全民的企业,现在国有资本上缴利润比例较低,而且上缴的利润90%又返回到国有企业中去使用,这是不恰当的。

一些常委会委员建议,进一步增加国有资本上缴的利润,主要应用于民生补偿、社会保障、全民福利、社会发展。部分利润应作为社会的股分发给财政,作为公共财政或者社保基金的收入,让全民共享国有企业利润,体现国有企业存在的必要性。

(摘自《新京报》文/宋锐哲)